

吴景超乡村建设思想解读 ——以《独立评论》为分析文本

曹金祥

(菏泽学院社会科学系, 山东菏泽, 274015)

摘要: 20 世纪 30 年代, 随着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 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农村。作为独立评论社的主要成员和重要撰稿人, 吴景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中国的农业发展类型进行了深入考察, 并在剖析农村破产原因的基础上, 提出了切合中国实际的乡村建设方案。以《独立评论》为分析文本, 解读吴景超的乡村建设思想, 不仅对于考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观和 30 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路向具有重要意义, 也可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 《独立评论》; 吴景超;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乡村建设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4-0090-05

20 世纪 30 年代, 在内战频发和外敌扣关的严峻形势下, 中国农村社会日益走向衰败, “农村经济破产, 已为公认之事实; 其恐慌之严重, 现象之险恶, 几有摧毁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及其存在之趋势。”^[1]在此背景下, 如何克服农业危机并实现乡村现代化, 成为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共同话题, 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着乡村的发展”^[2], 促使 20 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断走向高涨。受此影响, 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也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农村。

《独立评论》是“九·一八”事变后由胡适、丁文江等一批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文化精英创办的同人期刊, 虽然该刊只存在了五年多时间, 但却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最有影响的政论性刊物之一, 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独立评论社的主要成员和重要撰稿人, 吴景超从 1932 年 5 月至 1937 年 7 月间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共计发表论文 48 篇,^[3]其中近半数文章均论及中国农村及其现代化问题。在这些文章中, 吴景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当时中国的农业发展类型和乡村破产原因进行了详细考察, 并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解和分析, 提出了切合中国实际的乡村建设方案。

一、对中国农业发展类型的考察

作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工立国”论的主要代

表, 吴景超在探索中国工业化发展路径的同时, 对当时中国的农村和农业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是中国人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灵魂, 农业的地位特别重要。在他看来, 农村的发展和进步是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要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必须改良和发展农业, 这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先决问题。但 20 世纪 30 年代, 中国农村经济破败凋零, 农民生活苦不堪言, 能否挽救农村危机事实上已成为左右中国现代化成败的关键。

与当时纷然杂呈的其它乡村建设主张不同, 吴景超比较注重人口和土地等农业内在因素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他以严谨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考察了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类型, 提出了著名的“第四种国家”理论。

他认为, 世界上的不同国家按照人口密度及职业分布情况, 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人口密度颇高, 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 其百分数比较的低”的国家, 可以英、德两国为代表。其中英国的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多达 181.2 人, 仅次于比利时和荷兰, 位居世界第三。但英国人在农业中谋生的人, 只占从业者的 6.8%, 德国人在农业中谋生的人也只有三分之一; 第二种是“人口密度颇低, 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 其百分数也比较的低”的国家, 可以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等国为代表。其中美国的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只有 15.6 人, 从事农业的人口尚不足 30%;

第三种是“人口密度颇低，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比较高”的国家，可以俄国为代表。俄国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 6.9 人，但从事农业的人口却占从业人数的 86.7%；第四种是“人口密度颇高，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也比较高”的国家，可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这类国家的人口密度平均都在每平方公里 50 人以上，谋生的方法也以农业为主，从事农业的人口要占 70% 以上。

根据吴景超的分类，第一种国家的农产品大都不能满足本国人民生活所需，必须降低人口密度，同时还要在农业之外，积极发展工商业，依靠出口贸易所得向其它国家购买粮食，以维持过剩的人口。第二种国家的农产品不仅可以自足，而且还有部分剩余，其“人口密度与职业分派皆颇合适，可为楷模”。第三种国家职业构成不合理，如果能有效降低农业人口的比例，也可以转变为第二种国家。第四种国家则最为贫穷，人民的谋生方法主要是经营小块耕地，生产效率极低，人民的生活仅至温饱水平，人口密度与职业分配都需要改进。

吴景超最后指出：“中国既然属于第四类的国家，所以中国人的问题最为艰难。”^[4]中国要想完成工业化，必须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改造。基于这种分析，他在 1933 年提出：“改造中国的经济组织，别种实业的发展固然要注意，同时农业本身的改良，也不可忽略。英美的经济史以及最近俄国的五年计划，都表示无意的或有意的，工商业的发展，与农业的革命，是要并进的。中国人尤不可忽略此点。”^[5]在吴景超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改良农业，一方面要提倡实业，二者必须同抓并举，不能失之偏颇。

二、对中国农村破产原因的剖析

农村破产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焦点，由此引发的乡村建设运动也备受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关注。当时大部分学者均认为，复兴农村固然重要，但其前提是必须搞清楚中国农村何以破产的原因。如在 1933 年第 13 期的《东方杂志》上就有人撰文指出：“尽管农村的复兴运动，经朝野的鼓动和施行，成绩上稍有表现，但在农业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没有消除时，农业既没有发达的可能，农村也没有复兴的希望。”^[6]不过，在对农村破产原因的具体判分上，各家的观点却又不尽一致。吴景超通过对农村社会的深入调研，认为中国农村的凋敝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人口众多、技术落后等客观原因，也有土地不均和地主盘剥等主观因素。

（一）农村从业人口众多

作为一名职业社会学家，吴景超对中国的农业人口问题较之其他学者有着更加清醒和敏锐的认识。他指出：拥有四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在农业中谋生的人，据估计，在全人口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间，这点数目字，便可十足的表示中国农业生产方法的落后。”^[7]在他看来，农业人口众多是中国农村破产的重要原因。至于中国的农村人口何以如此众多，吴景超在与董时进的讨论中指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分散的小农式的经营方式，需要“多数人在农业中劳碌，才可维持全国人的衣食”^[8]。但我国的耕地面积却又相对不足，庞大的农业人口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既转移不出去，也没有转移的领域，使得我国的农业人口密度长期居高不下，形成大量剩余。

（二）农村土地分配不合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耕地面积的分配极不平均，土地集中现象十分严重。“因为历年来农村经济破产，灾荒频仍，农民已将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贱价典卖一空。”^[9]农村中的土豪和城市中的官吏成为土地所有者，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雇农或佃农。吴景超对这种土地分配不均现象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在《耕者何时有其田》一文中指出：“现在的农民，仍以自耕农为最多，占百分之四十六；佃农次之，占百分之二十九；半自耕农又次之，占百分之二十五。”农民的这种阶层分布，说明“中国没有田的农民以及虽有田而不够的农民，仍占全民二分之一以上，这个问题诚是人民生活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在吴景超看来，虽然孙中山先生早在 1905 年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并将其作为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民国政府也于 1933 年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但如果农村土地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则农民受压迫和剥削的程度必然加剧，农村经济的破产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三）农业生产技术落后

吴景超在《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一文中指出：“中国大众人民的生活，如与欧美各国人民比较起来，其程度的低下，乃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就农业生产而言，“我们虽然已有四千余年的经验，但生产的成绩，与欧洲各国比较起来，还是相差很多。”^[11]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平均产量，每英亩只有 648 磅左右，而同期英国的小麦平均亩产量却高达 1974 磅，是中国的三倍多。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吴景超分析后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太落后。由于庞大的农业人口争食着有限的土地，使得农场的规模越来越小。与同期的美国相比，中国农场在 10 亩以下

的,至少有84%,而美国农场在10亩以下的,还不到6%。农场规模如此狭小,再加上中国农民的保守性,使得机械化作业和规模化经营很难在中国实行开来,生产方式仍然是传统的个体手工劳动。这是造成中国农村普遍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农村交通运输不便

吴景超通过对农村的考察发现,旧中国农村的交通十分落后。因为交通运输的缘故,产粮区的粮食很难及时运达消费区,甚至造成“丰收成灾”的现象。在他看来,一方面,由于“交通不便等自然条件的制约,以致农民的出产品,在市场上得不到善价。假如农民要把他们的农产物运到价格较高的市场中去贩卖,结果因为旧式交通工具运费的昂贵,恐怕也得不偿失。”^{[12][15]}另一方面,由于运粮所经地区税捐太重,导致运费太高,商人不堪重负,不敢贸然尝试,结果所有物产均被重税所困,不能及时流通。这种情况“不但在交通比较不便的西北盛行,即使在交通可以说很便利的长江流域诸省也很通行”,^[13]甚至在有铁道可供运输的地方也不能例外。如此,因交通运输之故,产粮区剩余粮食无法运往南北歉收之省,导致米价日贱,贫弱省份的农民即使丰收之年也难免困顿之厄,这是导致农村破产的又一重要肇因。

(五) 农民所受盘剥太重

吴景超认为,中国农村之所以陷入破产的境地,固然有30年代世界经济大震荡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国内的剥削太苛、搜刮太苦,农民负担太重。他说,农民所受的盘剥主要来自地主、高利贷者、苛捐杂税、匪兵、奸商以及农民的子女。对农民子女为何是盘剥者,他指出这是由于中国广大农民缺乏节制生育的基本知识,并且中国人又有早婚的习惯,很多农民四十岁左右就已经子孙满堂。吴景超指出:“在农民的家庭中,这是苦恼的一个最大的来源。”^{[12][15]}

吴景超认为,由于农民受到如此之多的盘剥,大部分农村家庭不堪重负,生计困难,中国农村因此普遍陷于破产。正是由于此种原因,当时风行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运动也大都以改进农民的经济状况为主要目标。但在吴景超看来,中国农村的破产原因是多方面的,是政治、经济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应之道也应该是全方位的,不能只专注于农民的生计问题一个方面。

三、对中国乡村建设方案的设计

吴景超作为一个有着浓郁精英意识和经世思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独立评论》周刊存在的五年

间,不仅以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执著的探索精神,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破产原因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剖析,更以广阔的理论视野和独到的创新精神,提出了中国乡村建设的系统理论。

(一) 发展都市以带动农村

针对农村的破产,以解决农民生计问题为旨归的乡村建设运动自20年代起就不绝如缕。吴景超认为,由于中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左右,乡村建设运动的力量很难达于全体农民,而且农村问题错综复杂,涉及面广,不是单靠几个私人团体所能解决的,而应该将农民生计问题作为经济建设全局的一部分进行综合考虑。他在《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一文中明确指出:一般中国人在着手农村建设工作时“有的从政治入手,有的从教育入手,有的从自卫入手,还有许多走别的途径,去帮助农民的”,但却很少有人是从发展都市的角度去考虑农村建设的。“不但如此,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误认都市为农村的仇敌。他们以为都市对于农村,不但没有贡献,反可使农村的破产加深。这种误解,是应当矫正的。”^[14]

吴景超认为,发展都市对周边农村的贡献有三:其一,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太多,农业本身已无力解决,都市工业的发展则可以吸纳过多的农村剩余人口。如此,不仅入城农民有了立足之地,而且留在乡下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了。”其二,都市与周边农村和市镇存在“如胶似漆”的关系,发展交通运输业乃是都市建设的内在需求,而都市交通业的发展,可以方便农民的货物运输,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不仅可以减轻奸商的剥削,而且“这些农民的购买力加增,都市中的制造品便多一条销路”。所以,交通运输业的发达“是对于都市与乡村两便的事情”。其三,都市中的新式金融机关虽然很多,但其业务范围仅限于都市本身,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之职能,如果把都市中的金融机关扩充到农村,“一方面可以吸收内地的现金,来做生产的事业;一方面又可放款于内地,使农民减轻利息上的负担”,高利贷者也就无可施其技了。所以,在吴景超看来,都市与乡村的关系不是敌对的,而是互助的,如果以上三者做好了,则“对于农民的贡献,是很显然的”。^[14]

(二) 推广农业机械化

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界已普遍认识到“科学及机械的发明与由此而促成之人类的自然征服实为现代文明之一最大特色”。^[15]吴景超认为,美国的农民一年耕种所得,除交税和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外,还有剩余可以用于教育、卫生、娱乐、旅行和交际之用,而中国农民一年耕种所得,甚至连温饱问题也不能解决。

中美两国的农民之所以在生活程度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农民普遍采用机器耕作,而“我国的农民,做工的时日比别人长,而收获比别人少,就是他们不能利用机器的缘故”。“所以我国的农民,如想步美国农民的后尘,享受他们那种愉快的生活,非扩大农场利用机器以生产不可。”^{[12](22)}在他看来,要想尽快改变乡村的破产现状,提高农民的生活程度,使乡村走向复兴之路并最终实现现代化,必须重视农业生产方式自身的改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使中国的传统农业生产逐渐向西式的机械化生产过渡,向大农场转化。

(三) 实行节育政策

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推广,必然会减少农村从业人口,产生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加上我国农业人口众多,所以人口压力很大。吴景超认为:“中国人民的生活程度须要改进,这是无论什么人都承认的一个目标。如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好些事是非做不可的,其中有一件便是节制人口。”^[16]但是一些政府要员和“以农立国”论者却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为了保证足够的农业劳动力,根本没有控制人口的必要。为了批驳这种错误观点,吴景超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节制人口的原因和必要性:第一,庞大的农村人口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近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实行机械化生产,但是庞大的农业人口拥挤在狭小的小块耕地上,使得机械化生产根本无法展开。第二,庞大的农村人口造成了农村社会的贫困。资源有限,农民生产出的财富只能满足人口的日常生活需要,无法变成生产资本。过少的生产资料由过多的人来分配,必然要导致农民的贫穷和农村的落后。第三,节制人口是解放妇女和儿童的需要。吴景超指出:“中国做母亲的是世间最不幸的女子”,她们自十几岁嫁人之日起便负担起生儿育女的重任。一般的母亲要生育几个甚至十几个左右的子女,这给母亲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农村儿童也因弟妹众多而备受其苦,中国婴儿的死亡率甚至超过了文明国家的五倍。第四,工业化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膨胀。吴景超认为,工业化的结果可使人的享受增加,寿命延长,早夭等不幸事件减少,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是要减少死亡率。由于这两种因素的存在,使中国的人口膨胀超过了以前的速度。

基于以上分析,吴景超最后指出,中国“如不立行节制政策,将来一定要产生较现在还要严重的局面”。所以,节育政策就成为“各种救国事业之中一种最重要的事业,是建造新中国的各种办法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16]

(四) 转移农村剩余人口

吴景超认为,庞大的农业人口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成为“农村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14]若要真正救济农村,除了从根本上节制人口外,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发展农业以外的各种实业。

吴景超在《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一文中明确指出:“一国的经济组织,不是靠一种实业所能维持的,一定要各种实业平衡的发展,才可以收国富民荣之效。所以我们如想建设繁荣的中国,不但在农业上要努力,在别的实业上,也要有相当的努力。”^[8]有鉴于此,1933年他在《独立评论》第45期上发表《讨论“中国农民何以这样多”》一文,重申其五年前就已提出的解决中国农村剩余人口的一个重要办法,即“发展农业以外的实业,如工业,矿业,商业,交通业等等,疏导拥挤在农业中的人口,到别的实业中去。”换言之,就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在吴景超看来,兴办实业,不仅可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也可为广大农村人口转入都市就业创造条件。很显然,以今天的观点看,吴景超的这种思想无疑是非常正确而又超前的。

(五) 变革农村土地制度

吴景超认为,由于农村土地分配不公,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受剥削受压迫的佃农,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号召民众拥护政府并一致对外,必须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将大量佃农转变为自耕农,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有立即实行的必要。”由于中国的佃农太过贫困,无力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向自耕农的转变,政府必须设法从旁帮忙。其具体方案是:效法丹麦的方式,以政府的力量帮助农民买地,使佃农转变为自耕农;效法爱尔兰的办法进行减租,促使地主出售土地;借鉴东欧各国的办法,由政府以公平的方法,规定土地价格,避免地主囤地居奇;购买土地所需资金,应由政府全部借给农民,“至于此种款项之来源,或由政府举债,或发给地主以土地债券均可。”^[10]吴景超认为,这一方案既借鉴了欧洲农业国家的成功经验,又考虑到了本国国情,在实践中是切实可行的。

四、结语

《独立评论》时期吴景超的乡村建设思想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其通过中外对比,依据中国国情,以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察和改造中国农村社会的一种理论设想,是对中国乡村现代化之路的可贵

探索,包含着丰富的时代性内涵,比较集中地代表了 20 世纪 30 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乡村建设主张,在当时的理论界获得了广泛认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思想立场和社会环境的局限,吴景超缺乏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他对中国乡村建设方案的设计,均建基于经济层面,是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为前提的。他对共产党人推行的土地革命政策持排斥甚至批判的态度,认为“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所标榜的理想社会,只有实现的可能,而无实现的必然。”^[17]在“左派”激进主义者看来,其乡村建设方案的改良性和空想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这也正是吴景超乡村建设思想无法付诸实践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吴景超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民族主义立场和爱国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严格的海外学术训练和对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入调查,使其对中国乡村社会问题的理性考量,仍不乏深刻性和独到性。时至今日,他在节制农村人口、实行公平的土地分配以及发展都市以带动农村等方面的建言和主张,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不仅对于我们考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观和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路向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也可在诸多现实层面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参考文献:

- [1] 朱倮. 田赋附加税之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J]. 东方杂志, 1933, 30(22): 7-16.
- [2] 刘克辉.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述评[J]. 史学月刊, 2007, (11): 107-113.
- [3] 陈仪深. 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9: 343-345.
- [4] 吴景超. 世界上的四种国家[J]. 独立评论, 1933, (75): 4-9.
- [5] 吴景超. 讨论中国农民何以这样多[J]. 独立评论, 1933, (45): 19-20.
- [6] 张培刚. 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J]. 东方杂志, 1935, 32(13): 133-145.
- [7] 吴景超. 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J]. 独立评论, 1935, (136): 17-21.
- [8] 吴景超. 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J]. 独立评论, 1933, (40): 5-10.
- [9] 董汝舟. 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J]. 东方杂志, 1932, 29(7): 14-21.
- [10] 吴景超. 耕者何时有其田[J]. 独立评论, 1935, (165): 5-9.
- [11] 吴景超. 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J]. 独立评论, 1934, (115): 8-12.
- [12] 吴景超.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15-22.
- [13] 姜解生. 一九三二年中国农业底恐慌新姿态: 丰收成灾[J]. 东方杂志, 1932, 29(7): 8-13.
- [14] 吴景超.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J]. 独立评论, 1934, (118): 5-7.
- [15] 江公怀. 现代农业机械化的倾向[J]. 东方杂志, 1932, 29(7): 22-26.
- [16] 吴景超. 中国的人口问题[J]. 独立评论, 1936, (225): 6-10.
- [17] 吴景超. 阶级论[J]. 社会科学(清华大学), 1935, (10): 221.

An interpretation of Wu Jingchao's rural construction theory in Independent Review time

CAO Jinxia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Heze University, Heze 27401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ising of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the nationwide in 1930s, the liberal intellectuals related with Independent Review had begun to shift their attention focal point of the rural. As the key member and important contributor of Independent Review Community, Wu Jingchao had carried on the thorough inspection to Chinese agricultural type from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by using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sociology, and had put forward the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 conformed to the Chinese actual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bankrupt reason of the rural. The explanation to Wu Jingchao's rural construction theory by analysing of Independent Review as a text, not only has vital significance to inspecting the free intellectual's rural construction view and the development road of China village in 1930s, but also providing the model and the help for the emerging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Independent Review; Wu Jingchao; liberal intellectuals; rural construction theory

[编辑: 胡兴华]